

# 云雷纹的起源、演变与传播

## ——兼论中国古代南方的蛇崇拜

杨建芳(香港特区康乐文化署 博物馆专家顾问)

云雷纹是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纹样,尤其常见于青铜器。这种纹样象征何物?起源于何时、何地?有几种形式?如何演变?如何传播?这些问题迄今未见专文系统论述。下面提出个人的一些看法,以求正于方家。

### 一 史前时期云雷纹的起源和传播

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M248 曾出土一件红衣陶豆,豆盘外壁刻有一周 8 个整

齐的方折云雷纹,半数仍清晰可辨<sup>[1]</sup>。其中 3 个云雷纹里段末端呈简化的动物侧面头像(上下颌分开),外段末端则无异状,从整体看来,应是长身、张口的爬行动物的简化造型,笔者认为当是蛇的形象。另一个云雷纹里段末端和外段末端形状相同,与通常所说的云雷纹并无二致(图一)。这些纹样表现的应是同一事物,只不过有些稍写实,有些较抽象而已。据此可知,云雷纹的原型应是自然界的蛇,是蛇的抽象化和图案化。

三星村墓地的时代为距今 6500~5500 年。因此 M248 的年代下限当不晚于距今 5500 年,即早于良渚文化(约距今 5300~4200 年),而与崧泽文化年代(约距今 6000~5200 年)相当。所以,三星村墓 M248 陶豆上的纹样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云雷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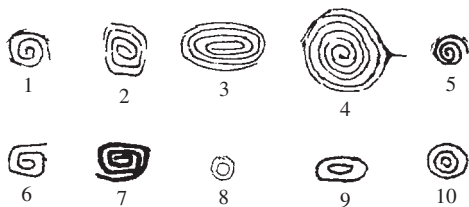
蛇的形象丑陋恐怖。在陶器上刻划蛇的形象应不是为了增加美感,而是先民因无力防治蛇患,转而奉祀其形象以期避害禳灾的自然崇拜现象。江苏南部是后来吴越民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其中的古越族便是著名崇蛇的族群,



图一 江苏金坛三星村 M248 新石器时代陶豆



图二 上海青浦福泉山 M65 良渚文化陶壶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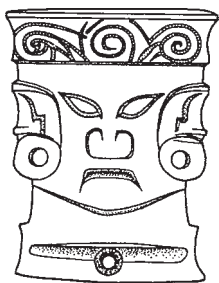


图四 良渚文化玉器云雷纹

1~3. 圆角云雷纹 4、5. 圆转云雷纹 6、7. 方折云雷纹  
8、9. 重圈纹 10. 三圈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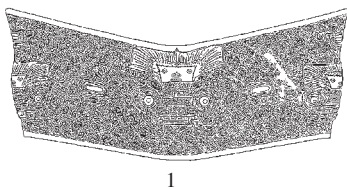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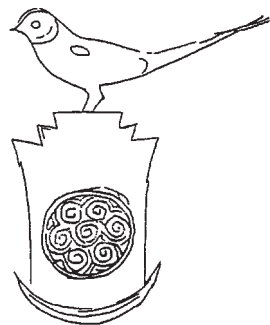


图六 湖南澧县孙家岗 M33 石家河文化玉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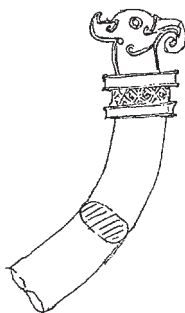


图七 湖北天门萧家屋脊瓮棺 W6 石家河文化玉人头

图三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良渚文化玉璧刻纹



图五 浙江余杭反山 M12 良渚文化玉瑁  
1. 玉瑁纹饰展开图 2. “三层花”特写



图八 湖北天门石河镇石家河文化凤首璜形玉器

云雷纹很可能是从这里发源的。根据考古资料,此后约 500 年或稍晚,云雷纹持续发展并向南和向西传播至今浙江北部和两湖地区,甚至向北传播至今江苏北部和山东一带。

今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纹饰亦反映了其崇蛇观念。例如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 M65、M74、M128 出土的陶鼎和陶壶(或带盖)都通体满刻鸟首盘蛇纹<sup>[2]</sup>,另外还有双盘蛇纹,整体呈横置“S”形,并在蛇身内及上下刻有许多圆转云雷纹(图二)。再如浙江余杭瑶山<sup>[3]</sup>、反山<sup>[4]</sup>,上海青浦福泉山<sup>[5]</sup>三地良渚文化墓葬出土的玉琮、镯、梳背(原定名冠

形器)、三叉形器、半圆形饰、镂雕牌饰、圆牌、柱形器、匙、匕形器和管等玉器,以及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传世玉璧<sup>[6]</sup>,皆广泛地以抽象蛇纹——云雷纹作装饰(图三)。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云雷纹以圆角者居多数,有方形、长方形、椭圆形等形式(如上述弗利尔美术馆玉璧、反山 M12 玉柱形器及玉琮<sup>[7]</sup>)。其次是圆转的旋涡形(如反山 M12 玉琮及玉权杖瑁<sup>[8]</sup>)。最少的是方折造型(如福泉山 M9 玉镯<sup>[9]</sup>、瑶山 M12 玉管<sup>[10]</sup>)。此外,尚有罕见的圆形或椭圆形重圈纹或三圈纹(如瑶山 M12 玉管<sup>[11]</sup>、江苏武进寺墩 M5 玉琮<sup>[12]</sup>),可能是圆转的旋涡形

云雷纹的简化,暗示后来的回字纹和重圈纹也可能是云雷纹的变形(图四)。

其中,方折造型可能是金坛三星村方折云雷纹的遗绪;圆角造型仍带有方折造型的痕迹,可能是将直角简易化而来;圆转造型则是圆角造型的进一步的发展。应着重指出的是,三种形式云雷纹(尤其是圆角者和圆转者)常两两共生,且各有繁简的差异。因此,以往将前两种称为雷纹,将后一种称为云纹的作法显然是多余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良渚文化玉器中云雷纹常被用于填补空白。例如神人、神兽、神鸟的身上和两个神徽之间往往都填满云雷纹,使玉器表面密布纹饰。最典型的是反山 M12 玉“权杖”璜上的纹饰——以云雷纹为地纹,神徽的人面、羽冠和兽眼都是浅浮雕加阴刻<sup>[13]</sup>(图五),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三层纹饰(“三层花”)的作法,也是尔后商周青铜器“三层花”的渊源。

两湖地区的史前云雷纹主要是湖南澧县孙家岗石家河文化 M33 玉笄上的阴刻方折云雷纹<sup>[14]</sup>和湖北天门石河镇萧家屋脊石家河文化瓮棺 W6 玉人头冠上的圆转云雷纹<sup>[15]</sup>(图六、七)。此外,1955 年湖北天门石河镇出土的一件玉凤首璜形器(原定名龙首璜形器),在凤首后端的二道凸棱之间有一列阴刻方折云雷纹<sup>[16]</sup>(图八)。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玉人头,其介字形冠上有一列圆转云雷纹<sup>[17]</sup>(图九),这件玉人头曾被认为是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直至石河镇萧家屋脊出土一件相似的玉人头<sup>[18]</sup>后才被确定是石家河文化遗存。

按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的陶

器并无云雷纹<sup>[19]</sup>。正如笔者曾著文指出的,长江中游一带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都曾受到下游地区史前玉文化的影响<sup>[20]</sup>,石家河文化玉器云雷纹应即源于下游地区。

行文至此有必要提及河南光山春秋早期黄君孟墓出土的一对人首蛇身玉饰<sup>[21]</sup>(图



图九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石家河文化玉人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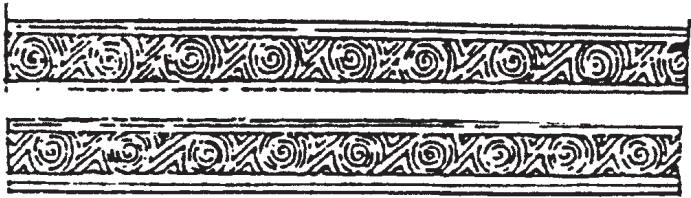
图一〇 河南光山春秋黄君孟墓  
石家河文化人首蛇身玉饰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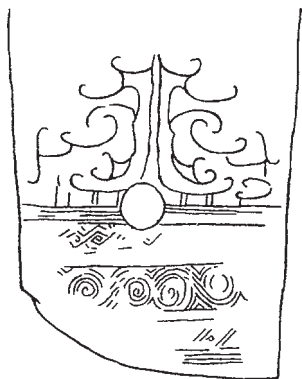
图一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文化人面纹玉圭(局部)



图一二 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藏  
龙山文化人面纹玉圭(局部)



图一三 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藏  
龙山文化曲棒形玉饰



图一四 美国安德鲁夫妇藏  
龙山文化人面纹玉圭(局部)



图一五 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  
物馆藏龙山文化镂雕有领玉环

一〇)。据学者研究其为石家河文化玉器,但在春秋时曾加刻龙纹<sup>[22]</sup>。《山海经》多处提到人首蛇身异物,《海内经》中更明确指出苗民(三苗)的神祇中有人首蛇身造型。石家河文化已被认定为三苗文化,这对玉饰应与云雷纹同样源于蛇神崇拜。

今江苏北部和山东一带在距今 4000 多年前是东夷族的聚居地,属山东龙山文化。在一些传世的典型龙山文化玉圭和镂雕有领玉环上也有云雷纹,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人面纹玉圭<sup>[23]</sup>、美国芝加哥艺术研究所藏兽面纹玉圭<sup>[24]</sup>和曲棒状玉饰<sup>[25]</sup>、安德鲁夫妇藏兽面纹玉圭<sup>[26]</sup>以及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藏镂雕有领玉环<sup>[27]</sup>(图一一:1,3~一五)。

按山东龙山文化陶器一般无云雷纹<sup>[28]</sup>,仅在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少量云雷纹陶片<sup>[29]</sup>。在江苏北部新沂花院新石器时代遗址曾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物与良渚文化(中期)遗物“两合”的现象<sup>[30]</sup>,这说明良渚文化的年代约与大汶口文化相当,即一般早于龙山文化。所以龙山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的云雷纹应来自一江之隔的苏南一带的良渚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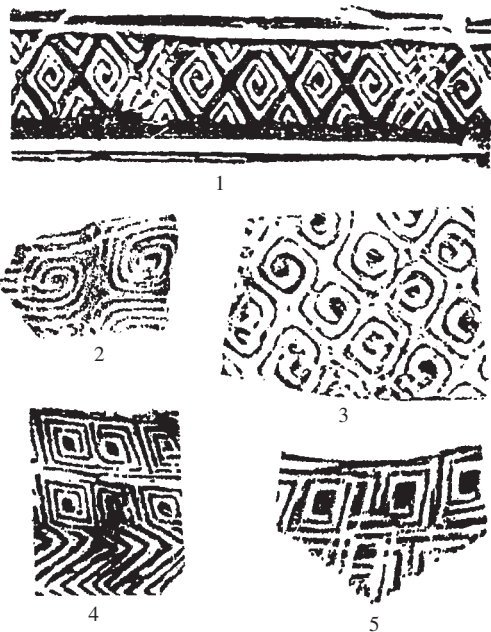
另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人面纹玉圭,人面纹两侧近耳部的阴刻人首蛇身异物(图一一:2)与上述石家河文化人首蛇身玉饰相似。山东海阳县嘴子前春秋墓 M4 出土的铜□<sup>[31]</sup>、淄博市国家村战国墓 M45 铜珩(原定

名璜)<sup>[32]</sup>、江苏北部淮阴高庄战国土著首领墓出土铜器也都有云雷纹或蛇纹图像<sup>[33]</sup>。由此可见蛇崇拜也传播至东夷的聚居地。

## 二 夏商周时期云雷纹在南方的传播

夏商周时期,云雷纹的传播范围更加广阔,除长江中下游一带和今山东之外,还向南遍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朝西进入成都平原,面北达于中原一带,可以说是云雷纹最繁盛的时期。

当时云雷纹(不包括圈点纹和重圈纹)在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盛行,主要体现在这一地域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器。据笔者粗略统计,上海马桥<sup>[34]</sup>、江苏丹徒大港葛村<sup>[35]</sup>、南京锁金村<sup>[36]</sup>、浙江萧山<sup>[37]</sup>、江山南区<sup>[38]</sup>、安徽含山孙家岗<sup>[39]</sup>、福建闽侯县石山<sup>[40]</sup>、溪头<sup>[41]</sup>、黄土仑<sup>[42]</sup>、福州浮村<sup>[43]</sup>、光泽<sup>[44]</sup>、广东中部低地区<sup>[45]</sup>、广州暹冈<sup>[46]</sup>、佛山河宕<sup>[47]</sup>、梅县大湖洋<sup>[48]</sup>、深圳叠石山<sup>[49]</sup>、湖南衡阳周子头<sup>[50]</sup>、岳阳铜鼓山<sup>[51]</sup>、石



图一六 夏商周时期云雷纹陶片

1. 上海马桥 2. 湖南岳阳铜鼓山 3. 江西德安黄牛岭  
4, 5. 广东佛山河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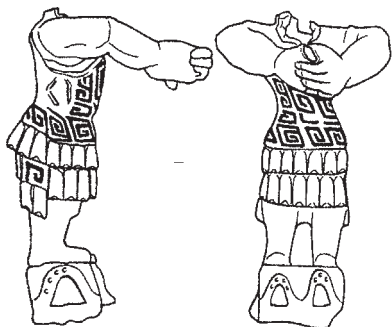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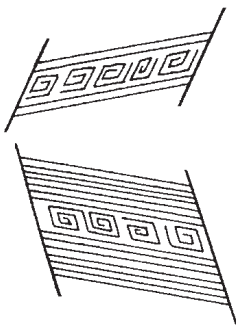
图一七 广东中部低地区商周时期几何印纹陶片



图一八 湖南宁乡黄材三亩地商代玉鱼及玉兽



图一九 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商代小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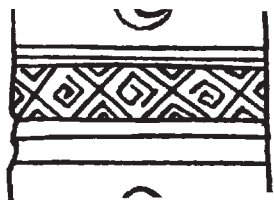
图二〇 四川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商代玉璋(局部)



图二一 湖北武汉黄陂盘龙城李家嘴 M3 商代前期玉蛇形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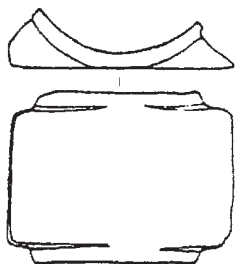
图二二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代云雷纹陶片



图二三 河南偃师二里头 IIIIM2 夏代玉圭(局部)

门宝塔<sup>[52]</sup>、皂市<sup>[53]</sup>、湖北沙市周梁玉桥<sup>[54]</sup>、松滋博宁山<sup>[55]</sup>、江陵荆南寺<sup>[56]</sup>、九店<sup>[57]</sup>、江西清江吴城<sup>[58]</sup>、新余拾年山<sup>[59]</sup>、德安<sup>[60]</sup>、玉山<sup>[61]</sup>、萍乡田中<sup>[62]</sup>等地夏商周遗址发现的几何印纹陶,都不乏云雷纹(图一六)。在这些云雷纹中,有的在里段末端呈大圆点或方块状,似简化的蛇头。广东中部低地区采集的一块几何印纹陶片,纹饰颇似双勾的简化云雷纹,其里段末端呈侧面蛇头状,有眼,吐舌(图一七)。这些都是云雷纹为蛇之抽象化的证据。

除几何印纹陶之外,云雷纹还见于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出土的陶、石工具、漆木器、青铜器和玉器。前三者如福建福州浮村遗址出土陶刀<sup>[63]</sup>、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残石斧<sup>[64]</sup>、湖北当阳曹家岗春秋晚期楚墓 M5 漆瑟<sup>[65]</sup>、荆门左冢楚墓漆木豆<sup>[66]</sup>、包山楚墓漆木俎、车饰和耳杯<sup>[67]</sup>以及河南信阳楚墓漆床、木俑、木编钟架、漆案、木座鹿角<sup>[68]</sup>等。后二者的实例也不少。商代晚期铜铙已以云雷纹为辅助纹样,而商末至西周早期铜铙则以云雷纹为主纹<sup>[69]</sup>。青铜容器



图二四 河南新密新寨遗址 T5⑤夏代玉琮

以云雷纹为地纹者更屡见不鲜,如湖南的人面纹方鼎、醴陵象尊、衡阳牺觥、常宁牺首兽面纹方尊、宁乡炭河里兽面纹提梁卣、黄材水塘湾分裆鼎和三羊纹鬲等<sup>[70]</sup>。这些铜器风格近似中原商代晚期铜器,都是“三层花”,即主纹是浅浮雕,以云雷纹为地纹,在主纹上再刻出细部,与良渚文化玉雕的“三层花”完全相同。其他带有云雷纹装饰的铜器、人像等更为多见,江苏溧水乌山西周墓铜方鼎还以云雷纹为主纹饰<sup>[7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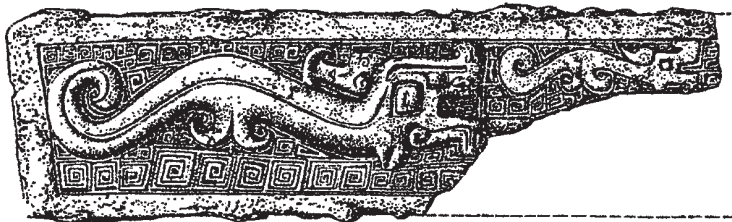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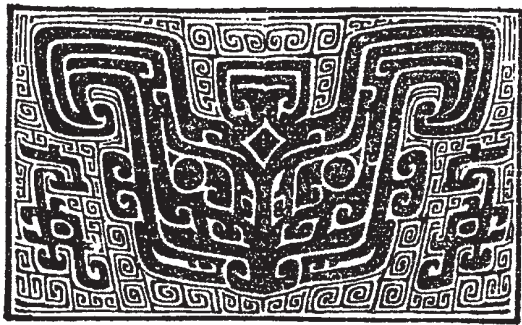
玉器云雷纹见于湖南宁乡黄材三亩地出土的商代晚期片状玉鱼和玉兽,都是圆角造型,其纹饰里段末端均呈大圆粒状,似简化蛇头,整体有如抽象化的盘蛇<sup>[72]</sup>(图一八),与前述几何印纹陶的云雷纹极为相似。另外,湖北荆门左家战国楚墓(M1)椭圆形玉饰上有方折云雷纹<sup>[73]</sup>。

在成都平原,云雷纹主要见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铜器和玉器。撇除具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尊、罍等礼器不论,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蜀式青铜器也都饰有云雷纹,如铜立人像、人身鸟爪形足人像、神坛、铃、挂饰、蛇残件等<sup>[74]</sup>(图一九)。玉器中也有3件璋有阴刻的方折云雷纹带,间或两个云雷纹连接成一个“S”形的连续方折云雷纹<sup>[75]</sup>(图二〇),这种连续云雷纹应是方折云雷纹的一种较晚的形式。

早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宝墩

文化(距今约4000~4500年)陶器并无云雷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素面玉琮<sup>[76]</sup>、简化人面纹玉琮<sup>[77]</sup>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良渚文化十节人面纹高身玉琮<sup>[78]</sup>都说明从新石器时代末期起成都平原与长江下游地区便存在文化交流,故可判定三星堆遗物上的云雷纹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几何印纹陶或玉器纹样。

以上论述的都是抽象的蛇的造型——云雷纹。其实,写实或半写实的蛇的造型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并不少见,如江苏吴县严山春秋晚期吴国窖藏龙蛇纹玉璜(原定名长方形佩)<sup>[79]</sup>、无锡鸿山战国越人贵族墓镂雕四蛇纹玉带钩和六蛇纹硬陶鼓座<sup>[80]</sup>、淮阴高庄战国墓蛇纹铜盘蛇纹玉管<sup>[81]</sup>、浙江杭州石塘镇战国墓T16:M6简化蛇首玉带钩<sup>[82]</sup>、义乌西汉墓蟠蛇钮陶盖鼎<sup>[83]</sup>、安徽屯溪春秋墓M3蛇纹方足器<sup>[84]</sup>、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M11铜车舌蟠蛇纹(原定各蟠虺纹)<sup>[85]</sup>、信阳战国楚墓彩绘藤质蛇<sup>[86]</sup>、叶县旧县战国楚墓M1<sup>[87]</sup>和淅川徐家岭战国楚墓M10<sup>[88]</sup>的“孕蛇”玉龙佩、湖北武汉黄陂盘龙城李家嘴商代前期墓M3的玉蛇形饰<sup>[89]</sup>(图二一)、当阳曹家岗春秋晚期楚墓M5漆瑟首挡面写实蛇纹<sup>[90]</sup>、随县曾侯乙墓棺上漆绘图案蛇纹<sup>[91]</sup>、江陵雨台山战国楚墓的蛇形铜



图二五 商代青铜器纹饰“三层花”

圈饰和浮雕蟠蛇纹漆卮<sup>[92]</sup>、马山一号楚墓凤践蛇纹绣和木辟邪蛇纹<sup>[93]</sup>、荆门左冢楚墓漆木车马器蛇纹<sup>[94]</sup>、湖南湘潭金棋村和岳阳筲口凤形嘴等地出土的带有蛇纹的春秋铜提梁卣<sup>[95]</sup>、资兴旧市春秋墓越式铜鼎耳部蛇纹<sup>[96]</sup>、传湖南出土现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的商代铜虎食人卣蛇纹<sup>[97]</sup>、陕西宝鸡益门春秋晚期墓(M2)楚式蛇首玉带钩<sup>[98]</sup>、江西贵溪春秋战国之际越人崖洞墓出土硬陶坛浮塑蛇形饰<sup>[99]</sup>、广东连平忠信坝上彭山出土的春秋蛇纹铜簠于<sup>[100]</sup>、广西恭城出土的八组双蛇斗蛙纹铜尊<sup>[101]</sup>以及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残铜蛇等。残铜蛇应为2件,头宽10或10.3,身宽7.6或8.4,尾宽5或5.4厘米,以现有的残件拼合计算,全长当不下于83.5厘米(最长可达111.6厘米或更长),形体相当巨大,通体有纹饰(主要是菱形云雷纹)且有羽翅,应是腾云驾雾的飞蛇(《山海经·中山经》提到四翼的鸣蛇),是古蜀人崇蛇意识的体现。至于楚墓出土与蛇崇拜有关的遗物,是楚人受土著三苗或越人文化影响所致<sup>[102]</sup>。

南方炎热潮湿,草木茂盛,虫蛇滋生特甚,宋玉《招魂》在列举楚国四方的害物时,指出南方之害有“蝮蛇(大蛇)”、“雄虺(蛇类)”,景差《大招》亦同样指为“蝮蛇”、“王虺(大蛇)”。《说文》曰“蛮,南蛮,蛇种”,又说“闽,东南越,蛇种”。春秋时“蛮”人分布的地域很广,包括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闽,是越人原来的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之民族<sup>[103]</sup>。这些都间接说明了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土著居民的崇蛇现象,类似习俗甚至在较晚的文献和民俗中仍有所反映<sup>[104]</sup>。

### 三 夏商周时期云雷纹在北方的传播与演变

早在夏代(二里头文化时期),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例,早、中、晚三期陶器分别以篮纹、细绳纹、粗绳纹为主,中期始出现云雷纹<sup>[105]</sup>(图二二)。此外,偃师二里头遗址墓IIM2出土的一件玉圭上刻有一横列方折云雷纹<sup>[106]</sup>(图二

三)。按在中原地区,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sup>[107]</sup>和煤山类型文化<sup>[108]</sup>陶器上并无云雷纹。所以,二里头文化陶器和玉器上的云雷纹应源于南方年代较早的同类纹样。只要留意南方史前文化因素(如良渚文化玉琮)在中原夏代遗物中的出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sup>[109]</sup>和新密市新寨遗址<sup>[110]</sup>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玉琮(图二四),便不难明白南方流行的云雷纹何以会在中原出现。

进入商周时期,云雷纹在中原地区的传播更加广泛。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几何印纹陶器便包括了方折、圆角和圆转三种云雷纹<sup>[111]</sup>。不过,据局部统计,这种几何印纹陶仅占郑州商代遗址出土陶片总数的0.05%<sup>[112]</sup>。而有云雷纹的青铜器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都有出土,甚而晚至战国时期仍不时出现<sup>[113]</sup>。令人瞩目的是中原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三层花”装饰手法的盛行<sup>[114]</sup>(图二五),这种手法与前述湖南晚商青铜器相同,应源于良渚玉器以云雷纹为地纹的“三层花”。

前面曾指出南方流行的云雷纹是当地先民对蛇崇敬的反映。然则,中原上古先民以云雷纹为器物的装饰,是否也具有同样的性质?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上古时期南方文化输入中原,因时间、地域和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其原来的内涵往往产生变异。云雷纹传入千里以外且属不同文化系统的中原地区后,其原有的象征意义逐渐模糊甚至消失。在中原先民的心目中,外来的云雷纹与传统的绳纹、方格纹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新的装饰纹样。云雷纹失去固有的文化内涵而徒具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趋向式微,到了汉代便罕见其踪了。

[1] 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

[2] 黄宣佩《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100、112页,图七〇、七六,文物出版社,2000年。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第35、39、44、54、78、84、116、119、133、134、137、142、154、161、180、

- 182、186、189、190页,图三二、三七、四二、五四、九一、一〇一、一四一、一四六、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九、一七七、一九二、二〇一、二二九、二三一、二三八、二四〇、二四一,文物出版社,2003年。
- [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第37~41、48、50、52、54、56、64、66~69、98、235、256、280、283、286、287页,图二〇~二五、三〇、三二、三四、三七、三九、四八、五〇~五四、七九、一九〇、二一〇、二二八、二三〇、二三三、二三四,文物出版社,2005年。
- [5] 同[2],第89页,图六五:1。
- [6] Julia K.Murray, Neolithic Chinese Jades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Orientalizations*, Vol.14, No.11 (Nov., 1983), P.16, Fig.4.
- [7] 同[4],第39、56页,图二二、三九。
- [8] 同[4],第56、67页,图三九、五一。
- [9] 同[2],第89页,图六五:1。
- [10] 同[2],第188页,图二三九:15。
- [11] 同[3],第186页,图二三八:14、16。
- [12] 江苏省寺墩考古队《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第四、第五次发掘》,徐湖平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第52页,图十六-1,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 [13] 同[4],第67页,图五一。
- [1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孙家岗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12期。
- [15]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石家河考古队《萧家屋脊》,第316页,图二五一:2,文物出版社,1999年。
- [16] A. 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B. 林巳奈夫《关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东亚玉器》第二册,第289页,图30.6,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
- [17] Soame Jenyns, *Chinese Archaic Jades*,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1, Pl.XXXI (upper).
- [18] 同[15],第316页,图二五一:1。
- [19] A. 同[14],第40页;B. 同[15],第148~151、237~238页;C. 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另,萧家屋脊出土的一件石家河文化晚期陶器座,其上有两个连续的旋涡纹,有如横置的“S”纹(同[15],第259页,图一九六:2),与本文所说的云雷纹不尽相同而且只有1件,故略。
- [20] 杨建芳《长江流域玉文化》,第59、64、68、203~20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 [21]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 [22] 林继来《论春秋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玉器》,《玉文化论丛1》,第9~10页,文物出版社、众志出版社,2006年。
- [23] 邓淑苹《中国史前的绝地通天》(英文),《故宫通讯》(英文双月刊)第26卷(1991年),1~2期。
- [24] A. Alfred Salmony, *Archaic Chinese Jades*, 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The Lakeside Press, 1952, Pl. LIV:2.; B. Alfred Salmony, *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Gillick Press, Berkeley, California, 1938, Pl. XXVII:1.
- [25] 同[24]A, Pl.XLIX:7。
- [26] 林巳奈夫《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第93页,图4-2,三联书店,2009年。
- [27] Doris Dohrenwend, *Chinese Jades*,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Canada, 1971, P.72.
- [28] A.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姚官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5),第13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B. 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等《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等《潍县鲁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D.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 [29]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第58页,三联书店,1955年。
- [30] A. 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第2期;B. 南京博物院《1989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徐湖平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第801~819页,图十六-1,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 [31]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东海阳县嘴子前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6年第9期。
- [32]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文物局《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及汉代墓葬》,《考古》2010年第11期。
- [33] 淮安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第150、153、199页,图一一、一四、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
- [34] A.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马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B. 曹峻《马桥文化再认识》,《考古》2010年第11期。
- [35] 尹焕章《关于东南地区几何印纹陶时代的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1期。
- [36] 同[35]。
- [37] 王士伦《浙江萧山进化区古代窑址的发现》,《考古通讯》1957年第2期。



- [38]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县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报》（1981），第73页，图七，文物出版社，1981年。
- [39] 安徽省展览、博物馆《安徽含山县孙家岗商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77年第3期。
- [40] A. 华东文物工作队福建组等《闽侯县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2期；B.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县石山遗址第六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 [41] 福建省博物馆《闽侯溪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 [42] 曾凡《关于福建史前文化遗存的探讨》，《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 [43] 曾凡《福州浮村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
- [44] 同[35]。
- [45]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中部低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 [46]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郊区暹冈古遗址调查》，《文物资料丛刊》（1），第177页，图一一、一二，文物出版社，1977年。
- [47] 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第10~11页，图四~六，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
- [48] 黄玉质、杨式挺《广东梅县大埔县考古调查》，《考古》1965年第4期。
- [49] 深圳博物馆《深圳市叠石山遗址发掘报告》，《文物》1990年第11期。
- [50] 衡阳市博物馆《衡阳市周子头遗址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3），第35页，图八：23，岳麓书社，1986年。
- [51]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5），第40页，图八：2，岳麓书社，1989年。
- [52] 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湖南考古辑刊》（4），第13页，图二：6，岳麓书社，1987年。
- [5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 [54]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0），第24~25页，图四：8，文物出版社，1987年。
- [55]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博宁山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0），第33~34页，图三：2、四：10，文物出版社，1987年。
- [56]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调查》，《文物资料丛刊》（10），第40页，图一：4，文物出版社，1987年。
- [5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第146页，图一〇四，文物出版社，1991年。
- [58] A.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B.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2），第6页，图六，文物出版社，1978年；C. 李科友、彭适凡《略论江西吴城商代原始瓷器》，《文物》1975年第7期。
- [5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余市拾年山遗址》，《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 [60] A.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米粮铺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B. 邱文彬等《江西德安、永修界牌岭商周遗址调查》，《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 [6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玉山双明地区考古调查与试掘》，《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 [62] 萍乡市博物馆《江西萍乡市田中古城遗址调查简报》，《考古》2011年第2期。
- [63] 同[43]。
- [64]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 [65] 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曹家岗5号楚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 [66]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荆门左冢楚墓》，第82页，图五四：5，文物出版社，2006年。
- [67]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第129、134、235、297页，图七九、八三：2、一五五：1、一九二，文物出版社，1991年。
- [6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第43、60、88、89、97、104、118页，图三〇、四〇、五九、六〇、六九：2、3、七二：1~3、八一，文物出版社，1986年。
- [69] 高至喜《商周青铜器与楚文化研究》，第21页，岳麓书社，1999年。
- [70]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出土殷商西周青铜器》，彩版一：1，二：1，三：1，四：1、2，五：1、3，七：1、2，一三：1、2，一四：1、2，岳麓书社，2007年。
- [71] 镇江市博物馆等《江苏溧水乌山西周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2），第67页，图三：1、2，文物出版社，1978年。
- [72] 喻燕姣《略论湖南出土的商代玉器》，《中原文物》2002年第5期。
- [73] 同[66]，第137页，图九六：7。
- [7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

- 162、167、171、220、230、233、234、293、300、310、321、326、327页,图八二、八三、八七、一二一、一二八~一三〇、一六二:1、一六五:6、一六九:4、一七六、一七八、一七九,文物出版社,1999年。
- [75] 同[75],第360~361页,图一九六、一九七:2。
- [76] 同[75],第81页,图四二:1。
- [77] 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藏品集萃》,图8,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 [7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玉器》,第40~41页,科学出版社,2006年。
- [79] 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春秋吴国玉器窖藏》,《文物》1988年第11期。
- [80] 南京博物院等《鸿山越墓发掘报告》,第108、305页,图九三、二五二:2,图版一二八、一三〇、一六〇,文物出版社,2005年。
- [81] 同[33],第150、153、179页,图一一、一四、五〇:3。
- [82] 李海《杭州古玉》,第91页,图85,文物出版社,2003年。
- [83] 汪济英、牟永抗《浙江义乌发现西汉墓》,《考古》1965年第3期。
- [84] 李国梁《皖南出土的青铜器》,《文物研究》(4),第176页,图版柒:2,黄山书社,1988年。
- [8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03页,图二二九:2,文物出版社,1991年。
- [86] 同[68],第119页,图八二。
- [8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省叶县旧县1号墓的清理》,《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 [88]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第326页,图三一〇:1,大象出版社,2004年。
- [8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205页,图一四〇:7,文物出版社,2001年。
- [90] 同[65]。
- [91]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30、34、36、39页,图一八、二〇、二一、二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
- [92]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第90、101、114页,图六九:2、七六、九二:9,文物出版社,1984年。
- [93]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第69、83页,图五八、六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 [94] 同[66],第73、102页、图四八:5、六八。
- [95] 同[70],第453~457页,图二。
- [96] 湖南省博物馆等《资兴旧市春秋墓》,《湖南考古辑刊》(1),第27页,图三:1,岳麓书社,1982年。
- [97] 同[70],516页,图三。
- [98] A. 刘云辉《陕西出土东周玉器》,第173页,图BY67,文物出版社,2006年。
- [99] 刘诗中等《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区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征》,《文物》1980年第11期。
- [100]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出土先秦文物》,第232页,图60,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
- [101]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恭城县出土的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1期。
- [102] 杨权喜《试论扬越对楚文明的贡献》,《百越民族研究》(彭适凡主编),第116~117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
- [103] 蒙文通《越史丛考》,《蒙文通文集》(第二卷),第229页,巴蜀书社,1993年。
- [104] 见《搜神记》(干宝)、《岭南杂记》(吴震方)、《赤雅》(邝露)、《粤江流域人民史》(徐松石)、《百越民族史》(陈国强等)和《“南蛮蛇种”文化史》(吴春明、王樱,《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福建南平市樟湖镇至今仍保留有蛇王庙,和有关蛇的节日活动。
- [1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
- [10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3期。
- [107] A. 赵青云、刘东亚《郑州□□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B. 安金槐《郑州牛砦龙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
- [108] 赵芝荃、郑光《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
- [109] 同[105]。
- [110] 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河南省新密市新砦遗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3期。
- [111] A. 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2期;B.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 [112] 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的几何印纹硬陶》,《考古》1960年第8期。
- [113]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第115页,图一三六,科学出版社,1956年;B.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第51页,图三五,文物出版社,1986年;C.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下转第86页)

- 科学出版社,1995 年;D. 四川省林、高汉玉《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丝麻织品的观察与研究》,《中原文物》1999 年第 3 期。
- [8] 高汉玉、王任曹、陈云昌《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6 年第 6 期。
- [9] 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县博物馆《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岩崖洞清理简报》,《文物》1980 年第 6 期。
- [10] 宋湛庆《我国古代麻类作物的种植历史和栽培技术》,《中国麻业科学》1987 年第 2 期;葛今《泾阳高家堡早周墓葬发掘记》,《文物》1972 年第 7 期;张懋熔《高家堡出土青铜器研究》,《考古与文物》1997 年第 4 期。
- [1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第 63~65 页,科学出版社,1957 年。
- [12] 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纺织品的研究》,第 59~79 页,文物出版社,1980 年。
- (责任编辑:郑 彤)

---

(上接第 40 页)

- 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第 199 页,图一三三:1,科学出版社,1995 年;D.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第 172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 年第 4 期。
- [114] A. 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2 期;B. 陈公柔等《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 年第 2 期。
- (责任编辑:刘 婕)

##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the Cloud-and-Thunder Design and Snake Worship in Ancient Southern China

Yang Jianfang

The cloud-and-thunder design, common on bronzes, was popular in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is design originated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Jiangsu Province during the Neolithic era. It was originally a representation of a snake, which was abstracted and transformed into a decorative pattern. This pattern then spread to Zhejiang, Hunan, Hubei, Shandong, Chengdu, and other areas, and even to the central plains. Its golden age was the Xia, Shang, and Zhou period. After that, the primary symbolic meaning of the design died away as it became more widespread, because of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he difference of historical cultural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areas. At last, it became a meaningless form, which basically disappeared in the Han dynasty.

## 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墓发掘简报

2002年,连云港市博物馆对海州区双龙村的西汉墓(M1)进行了发掘。M1墓室东西长4.2、南北宽3.6米,内有两个椁室,共放置4具漆木棺。随葬器物有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角器、木牍等,其中木牍包括名谒和衣物疏。墓主人可能是西汉中后期的地方官员。在M1的三号棺内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从出土的龟纽铜印看,墓主叫凌惠平,死亡年龄大约55岁,可能是男性墓主人的妻子。

## 南京西善桥明代长春真人刘渊然墓

2010年12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梅山村发掘了一座明代单室券顶砖墓,从出土墓志可知墓主为明代早期道教领袖长春真人刘渊然。墓室内出土铜炉、铜烛台、铜瓶、铜尖状器、漆碗、石地券及墓志等,其中墓志虽残存百余字,但对文献记载有所补正。此墓的发现对于研究明代墓葬制度、道教礼仪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云雷纹的起源、演变与传播

——兼论中国古代南方的蛇崇拜

云雷纹流行于商周时期,常见于青铜器。本文通过对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这种纹样应于新石器时代起源于江苏南部,是对蛇的形象的抽象化和图案化的表现。此后这种纹样传播到浙江、湖南、湖北、山东、成都等地以及中原地区,在夏商周时期最为繁盛。然而,因时间、地域和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其原来的象征意义在传播过程中渐渐模糊,成为失去内涵的形式,到汉代已基本消失。